

邢建榕 主编

一片云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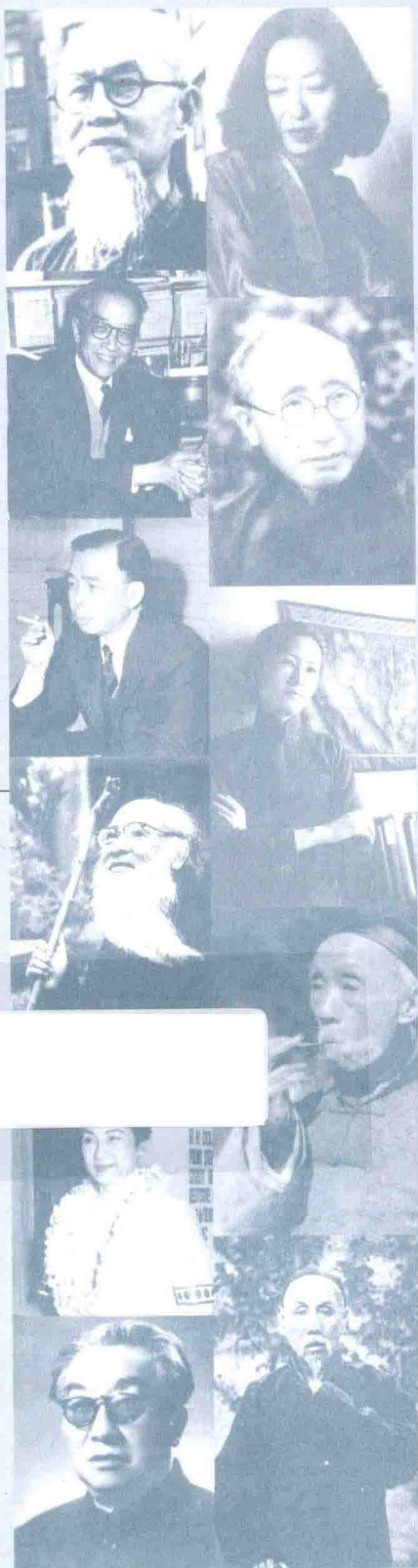
民国文人归宿

YI PIAN YU

MIN GUO WEN REN GUI SU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一片雲彩

乙未夏 曾德平 謹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片云彩：民国文人归宿 / 邢建榕主编.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8

(民国文人系列)

ISBN 978-7-5326-4422-3

I. ①一… II. ①邢… III. ①文人—人物研究—中国—民国 IV. 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48574 号

一片云彩——民国文人归宿

邢建榕 主编

责任编辑/刘大立 封面设计/多吉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辞书出版社出版

200040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 www.cishu.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浙江省临安市曙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22.5 插页 3 字数 380 000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6-4422-3/K·1010

定价：49.00 元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571—63783589

序

《论语·里仁》记载，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见贤人而求与之齐平，是中国古代文人修身养德的律条和追求，适用至今。“以我观物”是王国维先生《人间词话》中的一句，讲的是看待事物的观点、立场和方法。这两句借用于此，意在希望读者读本书，消遣之外，亦能有些生活态度的感悟，甚至人生哲学的收获，即所谓从感性认知到理性认知的升华。谈到认知，除先贤圣哲，据说普通人的经验，多由观他人之经历所得。换句话说，心中有偶像，可启发人昂扬向上；远方有目标，能激发人奋勇前行。

民国是个大舞台，众星云集、各展风骚。陈寅恪先生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虽言学术，大体也可见民国时期社会环境及文化风气。如此氛围，成就了那个波澜壮阔的民国文人群体，凡能列举的社会领域，均有一批大师扛鼎执旗，各美其美。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的品性、操守、学问、成就令人感佩。当年，他们健在时，这个群体如天际的云彩，须仰视才见。而今，书中的大师们驾鹤西去，以云彩相喻却也恰当。“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近年来，研究民国文人的述著多如繁星，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其推动力不外乎两点。一是怀旧和信仰。当今社会，世事纷繁复杂，民众身处众生喧哗之中，忙碌、躁动、焦虑、怀疑、不安……各种负面情绪接踵迭至。人该如何面对，寻求自己内心的平衡？于是，对那个大师频出的民国时代的遥念，成为某种寄托或需求。其本质是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对儒家德行中“精华”回归的期盼。二是人性的好奇。

扒名人的轶事，虽然能沾上文化的边，本质上同样是一种八卦，“人皆有八卦之心”。

中国人是重结局观念的一个群体，凡事总要交代个结果，事情是这样，人亦如此，名人更甚。无一例外，书中这些人物的离世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他们的人生往往和时代紧密相连，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从生命的历程来讲，经历过青年时代的动心忍性和学养积淀，很多大师的重要活动或重要成就集中发生在中晚年时期，或有与其他显要人物纵横交织的联系，或参与过意义非凡的历史事件。最后时光往往是他们人生的成熟期，老骥伏枥，硕果累累。

本书将部分民国文人的的人生简化，仅撷取他们的最后归宿，着重记述最后生涯和心路历程。人物类型涉及名校祭酒、五四闻人、知名作家、一代报人、睿智哲人、悲情诗人、出版健将、史林名流、文坛才女、爱国名僧等，亦有四大名旦、丹青妙手、银海明星收录其中，甚至还包括了几位堕落文人的代表。显然，书中所涉人物并未局限狭义所指的文人，而是定位为广义上的文人。文化(culture)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交流中普遍认可，且能够传承的意识形态。从这个角度讲，文人的内涵和外延博大精深、包罗万象，书中所载的这些传主亦可囊括。另外，就时间而言，所谓“民国文人”，只是相对而言。书中的许多人，前经晚清、北洋，后历新中国，但大多数时间是活跃在民国文坛之上，他们的归宿或不一致，却无不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民国命运多舛，也因此风起云涌。时代的洪流中，很多文人用一生探寻自己前

行的方向。他们中，有的是坚定的革命者，不屈的文化斗士，矢志不渝，始终如一；有的是上下求索，碰壁不悔，终于找到理想归宿的真君子，品性高洁，执着于信念；有的是皓首穷经的老学究，不闻窗外事，青灯黄卷终老书斋。也有操守败坏、泥沙俱下的堕落文人，甚至晚节不保，为人不齿，沦为孔子所指的“不贤”，本书亦将之引入，权作反面教材。瑕不掩瑜，稗谷不坏良田。总的来说，乐观、坚定、正直、通达是绝大多数民国文人的共性。时代的风云、国家的命运，成就了他们，也影响着他们，他们承担了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人更复杂、更沉重的责任。然他们义无反顾，自发自觉与国家、民族、社会和人民的命运共担，哪怕身逢巨大的灾难，亦不逃避、不畏缩。他们忍辱负重、浩然正气、正直磊落的秉性长存于天地之间，这种中国传统文人的温、良、恭、俭、让之美德，是我们民族的民粹。而他们，也堪称民族的脊梁，是指引后来者前行中的美。除了感动后人之外，更堪引为楷模。

多年前，笔者主编过《民国文坛名流归宿》一书，此次应上海辞书出版社之邀修订再版，改名《一片云彩——民国文人归宿》。题目看似风雅，实则通俗，恰好符合本书的旨意。本书是集体创作的产物，大部分文稿均结合新素材，增加新信息，提炼新观点。另有部分人物另起炉灶，重新撰写。作者虽与书中的传主并无亲炙之幸，谈不上“亲历、亲见、亲闻”，但他们讲史实、重考据，态度严谨认真，写法上，兼顾学术性和通俗性，在史实准确、叙述客观的同时，尽量做到文字生动、逻

辑清晰。作为一书主编，笔者谨对他们的付出表示衷心的感谢，若有不当之处，亦请读者识正。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说的文人涵义宽泛，但又未将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网罗其中，因其已出版传记专著甚多，读者获取他们的信息相对便捷，想必读者会予谅解。

邢建榕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六日

目录

序

王闳运：空余高咏满江山	001
马相伯：树师表于人伦	007
吴昌硕：一耕夫来自田间	012
林 纾：译笔有真灵感	018
陈三立：百忧千哀在家国	023
辜鸿铭：北大顶古怪的人	028
康有为：徜徉于寥廓之间	033
齐白石：海为龙世界，云是鹤故乡	039
黄宗仰：怅望云天不胜愁	045
罗振玉：以清代遗臣自任	050
伍光建：翻译界之圣手	055
张元济：戊戌老人跨进新时代	060
章太炎：保国学于一线	067
吴 虞：《吴虞文录》出版以后	073
张伯苓：我离不开南开	077
王国维：五十之年自沉昆明湖	082
刘大白：红豆双双贮锦囊	087
弘 一：信念终成苦行僧	092
陈 垣：“国宝级”的史学家	097
马一浮：鬻字代劳 藉易升斗	102



苏曼殊：革命的和尚	108
周作人：重回“苦雨斋”	113
熊十力：唯学圣人之道	118
蒋梦麟：迁台后的“土地改革家”	124
邵飘萍：昂然而笑 从容就义	129
张竞生：“性学大师”的第二人生	132
张季鸾：三十年笔墨生涯	137
王云五：再执台湾出版界牛耳	142
梅贻琦：清华不了情	148
刘半农：中国实验语音学之先驱	153
胡 适：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	160
张资平：晚境凄凉的“汉奸文人”	167
顾颉刚：死了才算是我的定本	173
张申府：讲真话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177
吴湖帆：画画是崇高的艺术	183
梅兰芳：举家迁回北京	190
张恨水：毛主席接见过的小说家	196
林语堂：名扬天下的幽默大师	203
冯友兰：修辞立其诚	209
蒋廷黻：好打高尔夫的“外交官”	214
傅斯年：归骨于田横之岛	219
郁达夫：一枝彩笔耀南天	224
徐志摩：悄悄的我走了	229
罗家伦：壮志长歌出汉关	235
朱自清：站到人民的立场上来讲话	240





郑振铎：新中国文物保护的当家人	247
张大千：看山还是故山青	254
荀慧生：蹲“牛棚”的京剧艺术家	259
尚小云：惜天不假年，遗恨多多	266
凌叔华：我的心还留在中国	273
曹聚仁：国共和谈的桥梁	279
梁实秋：秋公八十春不老	286
程砚秋：砚田勤耕秋为收	292
林徽因：为了故都的风光	299
朱 湘：与落花一同漂去	306
胡 蝶：在温哥华的最后岁月	311
徐 訆：人生百年一梦	316
阮玲玉：真假遗书之谜	322
萧 红：与蓝天碧水永处	328
穆时英：迷失在上海狐步舞中	334
周 璇：好花不常开	339
张爱玲：洛杉矶的隐士	345



王闾运（一八三三～一九一六），湖南湘潭人，初名开运，字壬秋，号湘绮。学者、文学家。潜心讲学，时人尊为“耆儒”。著述极丰，以诗文闻名天下，有《湘军志》、《湘绮楼日记》、《湘绮楼诗文集》等，后人辑为《湘绮楼全书》。

王闾运：空余高咏满江山

何 品

辛亥革命以后，有身份的人物大多剪去发辫，穿上西服，而王闾运却不改头换面，依然拖着根小辫子。一个年近八十的老人，思想保守不足为怪，他对中华民国没有好感，曾说过“自古未闻以民主国者”之类的话。不过他的为人、思想比他同时代的一班文人要开明些，他在清朝从未任过一官半职，到晚年虽然得到过“钦赐翰林院检讨”，后又加“翰林院侍讲”衔，前者为从七品官，后者为从五品官，但均非实职，所以谈不上死忠于清王朝，只是以清朝遗老终其身。

一九一二年，袁世凯当了大总统，想罗致当时有名望的文人，以壮声势，王闾



清朝遗老王闳运

运的弟子杨度、夏午贻等人都在袁世凯身边做官，由于他们的推荐，袁命令湖南都督汤芑铭，礼聘王闳运入北京去做国史馆馆长，王闳运接受了聘请，但没有立刻去北京，而是在武汉、上海走了一遭，心存观望，自抬身价。一九一四年五月，袁世凯再次邀请王闳运进京，并亲自致函王，自称“世侄”，语气谦恭。王闳运不再推辞，他有些遗老思想的朋友，力劝他不可“出山”，他一概置之不理。王闳运同意做国史馆馆长，除了想在学术上更有所作为外，当然也想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他在清朝郁郁不得志，现在应袁世凯的聘请，是期望作

帝王师，他曾说过“用予言或可救世”等语。

他由湘潭乘轮船赴长沙，所带行李仅小箱一口，而书籍、古玩、字画等物件却有百余箱之多，行至岳州（今岳阳市），第三师师长曹锟奉袁世凯的电令，派军队护送到京，于是王安抵北京，所受礼遇不可谓不高。

王闳运要向袁世凯发挥他的政治主张，到北京后就去与袁会面，然而袁却仍把他视作读书人，不与他谈论国事，“谈久之，无要语”，令王大失所望，而王闳运在北京几年，与袁就仅见过这一次面。袁世凯为了笼络人心，又给了王

一个“参议院参政员”的虚衔。

王闿运未去北京以前，袁世凯连续致电敦促起身，语气谦恭，王抵京以后则又泛泛视之，仅用自备汽车迎接，因此王对袁也多有不满，曾经写过一副对联暗中臭骂他：

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

横批为“旁观者清”。这副趣联被北京各家报纸竞相转载，轰动一时，弄得袁世凯非常扫兴。

王闿运向以诗文见长，据当时人的印象及回忆，他相貌清俊，谈吐清朗文雅，能言善道，但市井小贩的土腔土调也常常穿插于老人的言谈间，生性诙谐，思维敏捷，且又放任不羁，举止随便，行为举止常有出人意料，被视为“老怪物”。关于他的趣事轶闻，不胜枚举，为人津津乐道。他穿着一袭长袍大褂，因经常用两袖揩拭鼻涕，以至污垢生光，也不加洗涤。乍一相见，土里土气，完全一副老学究的神态，如果不是久闻其名，实在不敢相信他是一位饱学之士。

王闿运入北京就职国史馆馆长，当时的名流如樊樊山、易顺鼎等人曾设宴招待。酒酣耳热之余，食客随意聊天，王闿运说起他走遍各地，吃到的酱油，无法与其家乡湘潭出产的相比。于是易顺鼎开玩笑地说了一句：“湘潭出将。”“酱”、“将”同音，此局也暗示王闿

运了得，而王也迅疾回敬道：“龙阳出相。”龙阳，今湖南汉寿，是易顺鼎的老家，而龙阳君据说是嬖童，北方人称为“相公”，即男妓的雅称。此句妙语一出，举座称好，易顺鼎却是啼笑皆非。王闿运的厉害由此可见一斑。

袁世凯一世奸雄，翻云覆雨，对人玩弄权术，唯独遇到王闿运这个老头子倚老卖老，讽刺揶揄，却拿他没有办法。据说王闿运去见袁世凯的时候，带着女仆周妈，同袁会面后把周妈叫来说道：“这就是现在的大总统，我以前给你讲过，这位公子爷面相好，他日必定富贵，现在不是果真灵验了吗？”说罢呵呵大笑，搞得袁世凯局促不安，神情尴尬。又有一日，王闿运酒后坐车经过新华门，他抬头看着门匾说道：“我老眼昏花，匾额上所题，该不是‘新莽门’吧？为何题这样不吉利的字呢？”“新莽”意指西汉王莽篡夺帝位，改国号为“新”，但很快覆灭，王闿运知袁有异志，故意为之。王这一句话，吓得听的人不敢应答。

叶德辉曾投王闿运门下，王去世后，他作了一副挽联：

先生本自有千古，

后死微嫌迟五年。

这副妙联颇有王闿运调侃之遗风，所谓“迟五年”，意在批评王闿运“晚节不保”，在民国时期受袁世凯之聘为国史馆馆长，并曾劝袁做皇帝的旧事。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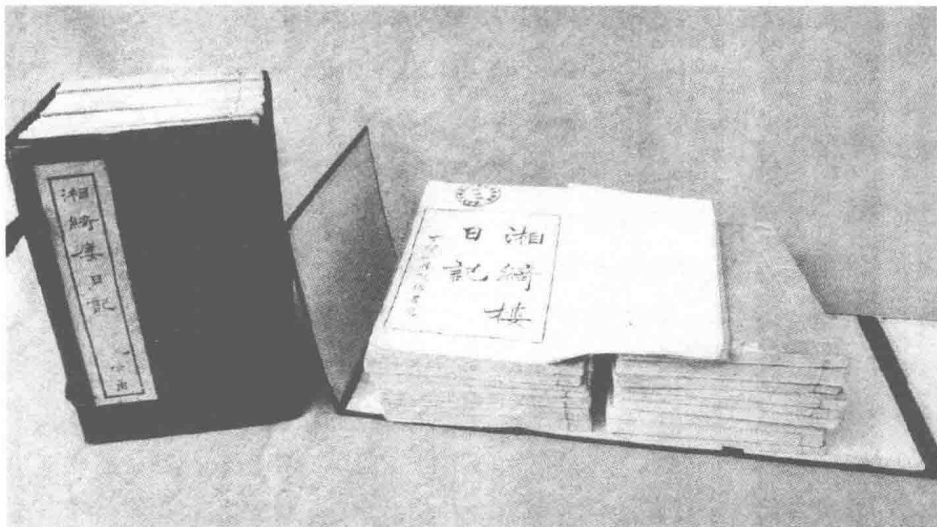
实，王闳运同意做馆长，意在政治上、学术上有所作为，并不为过，而说到他曾“劝进”袁称帝则有点冤枉。袁世凯决心做皇帝，王闳运实际上并不赞成，他的大名赫然列在“劝进人”名单上，是其拥袁的弟子盗用所致，王一时也有口难辩。袁世凯为称帝做准备时，因王闳运是清朝遗老，怕他持异议，曾嘱咐杨度写信给他，隐晦地表示袁的意思。而王闳运给杨度的回信中有这么一句话：“总统为人民公仆，不可使仆为帝。”可见其不赞成，而王以后辞职回故里，与他不支持袁称帝、不愿意再呆在北京不无关系。

袁世凯在政治上不重用王闳运，但在经济上待他不薄。王闳运到北京后，因年纪大，不屑于写公文书牍，与其他

机关很少往来，只是每月照例须行文财政部拨发经费，而且还要经办若干手续。王闳运不耐烦，告诉袁世凯，如要他做沉溺于繁文缛节的官僚，那他只好辞去职务。于是袁世凯面嘱财政部长，只要是王闳运要用钱，可随时凭王的个人书函支付给他，不必等手续齐备。所以王闳运任职一年多，每月支用经费，要么在名片上书写几句，要么就在求字者给的大幅宣纸上写几句，交给财政部。有时甚至在扇面上写一首诗来代替书柬，未曾有过一件正式公文，而财政部都照付钱款。所有的手续，还都是在王闳运辞职后由杨度代理国史馆馆长时补齐的。

王闳运自来京就任后，所办的第一件事，就是与财政部计较薪俸的发给期

王闳运《湘绮楼日记》初印本



限；第二件事是编制预算，向财政部领款（每年十二万多）；第三件事是呈请任命总纂、协修；第四件事是颁布馆令；而办的第五件事恐怕就是弃职返乡了。反正是个闲差，数月不干正事，养人而已，至于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则还未议及，只见派人用钱。据说曾有一政界要人拜访王闿运，询问国史馆近况，王闿运答曰：“无事可办，吃饭而已，吃饭而已。”时论评道：“今日之政界，皆吃饭问题，特无人敢说出，王先生可谓一语道破矣！”

国史馆开办年余，除委出一大批职员外，未办一事，而馆中成员又十分复杂，互相倾轧，皮毛琐事搞得王闿运十分不耐烦，动了回乡养老的念头。一日，参议院开大会，王闿运也破天荒地出席，别人怀疑王闿运是以为这天闭会，所以肯劳大驾前来。有人因此问王闿运，而王答道：“我今天到会，乃是与诸君话别而来。”听的人尚不放在心上，以为他在说笑。不久王闿运遇到杨度（杨是王的弟子，也是王二儿媳的哥哥，时任筹安会理事长），告诉杨要回湖南。杨惊问何时动身，王答称明日早车，杨因事出突然，只好说届时到车站送行。

第二天，杨度到车站，王闿运忽然说道：“我有一事托你。”杨问何事，王说：“国史馆之印，请你替我收存，我已办了咨文，送到你公馆里去。”杨度惊

愕地说：“别的事还可，印信我怎么能收存？”王说：“某某要我将印交与你们，我不放心，故尔托你。”杨度见王闿运说不明白，而车又将开，无可奈何，只好答允。等回到公馆，果然见有公文一函、私信一封及国史馆印信一颗放在桌上。给杨度的公文是这样写的：

本馆长有事回湘，馆中事务，拟令门人杨度代理，如杨不得暇，则请宋老前辈代理；如宋老前辈不得暇，则请曾老前辈代理；如曾老前辈不得暇，则请柯老前辈代理。好在无事可办，任何人皆可代理也。此令！

杨度看后，哈哈大笑，知道他的老师又大发幽默了。宋育仁、曾广钧、柯绍忞都是清朝翰林出身，王闿运虽于光绪末年得以钦赐翰林，但辈分比前三人低，而实际上王的年龄比三人都大，故王戏称其为“老前辈”，听来有趣，时人也引为笑谈。杨度因为这事不能私相收受，只好向袁世凯请示，袁也不知该怎样批复才好，只得令杨度代理国史馆馆长。

王闿运于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十二日乘车南下，十四日到汉口，写信给袁世凯说明辞职原委。王说，财政部欠国史馆经费，屡催不得，因不得经费，致被馆员纷纷索问，不胜其辱，只好辞职。这也只是他辞职理由一小部分而已，其实他的辞职原因颇为复杂，不愿支持袁称帝是一说，另一说认为，女仆周妈与

馆员发生摩擦，及国史馆协修宋育仁公开发表还政清室演说被捕，才是最大原因。

王闾运因年事已高，信任其女仆兼侍妾周妈，馆中一切杂事庶务都交由周妈管，视“国史馆”这个公共机关无异于其家政。馆中的仆佣人等，多系周妈所推荐，于是他们自恃有后援，遇事懒散，目无纲纪，馆员多有不满。一日，一馆员与一仆人为了一件小事而争执不下，馆员盛怒之下，叫来巡警把仆人捕去。谁知仆人乃是周妈亲眷，周妈气呼呼地要王闾运出面讨人，王用名片将人索回，于是馆中人知道消息后大为气愤。王闾运内忧外患，一时调停无效，只好偕周妈借故出京回乡。事情真假莫

辨，难有定论。

王闾运出京后一去不归，其政治生涯便告终结。王闾运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终于民国，其间政治得失，人物消长，此老可谓身经目击，有人评说，王氏之能成为一代大儒，实由失意仕途所造成，如果官运亨通，则学术上则无此成就，实不无道理。

王闾运回湘潭以后，一九一六年五月底患腹胀病，十二月二十日病逝，享年八十四岁。生前，自知病重不起，乃命儿孙持纸笔陈于卧榻上，倚枕疾书，自撰一联曰：

春秋表未成，幸有佳儿传诗礼；

纵横计不就，空余高咏满江山。

不啻这位文人兼奇士的确切写照。



马相伯（一八四〇～一九三九），江苏丹阳人，原名志德，又名建常，改名良，字相伯，以字行，教名若瑟，晚号华封老人。教育家、政治活动家。著有《一日一读》、《致知浅说》等，译有《灵心小史》，后人编有《马相伯先生文集》、《马相伯先生国难言论集》。

马相伯：树师表于人伦

季 林

马相伯生于一八四〇年。这一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社会步入了多灾多难的近世之秋。一八五二年，十二岁的马相伯只身前往上海徐家汇，进入法国天主教会创办的徐汇公学（今徐汇中学）读书。

在长期的教会生活中，马相伯不仅学到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也看到外国人对中国人的轻蔑与欺侮。他欣赏维新派的维新改良活动，曾想帮助梁启超在上海创办一所培养高级翻译人才的译学馆。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逃亡日本，创办译学院之事搁浅，但马相伯创办学校，“开启民智”的想法无论如何也放不下来了。